



YANAN
WENYI ZUOTANHUI
JISHI

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

高杰 著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然而关于它的具体情况，很多健在的历史当事人仍语焉不详……

★20年的苦苦追索，寻访亲历者，考证真实性，一部用全部生命激情投入的未竟书稿……

★本书以生动的笔触，真实的细节，发掘事件真相，破解历史谜题，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真实历史情景。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014004132

I253.5
35

延安地平线丛书
YANAN DIPINGXIAN
CONGSHU

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

高杰著



北航

C1690773

I253.5

35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高杰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延安地平线丛书)

ISBN 978 - 7 - 224 - 10635 - 0

I. ①延… II. ①高… III. ①文艺—座谈会—史料—
延安市—1942 IV. ①I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4145 号

延安地平线丛书 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

作 者 高 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0.2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635 - 0

定 价 38.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多年追踪寻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考证会议的具体历史细节，用生动的笔触，描述此次会议的筹备、召开、结果，对于会议议题变动、与会代表、会议发言情况，以及历史文本形成等等，都有详尽考证辨析，是迄今该领域最为详细缜密的一部未完成书稿。作者不幸因病辞世，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二，其余部分留下写作提纲和相关材料。为了尊重作者的意愿，有利于学术研讨，征得作者家属同意，整理该书稿出版。已完成部分按原稿编排，同时收入作者在该学术领域相关专题研究成果，未完成部分以提纲和材料构思形式编排，保存思想真实，期待学术后嗣。



目录

CONTENTS

· 第一辑 实况再现 ·

- 一、座谈会总体情况及相关问题说明 /3
- 二、时序风物、会场布置与作息时间表 /5
- 三、毛泽东入场及开幕《引言》 /16
- 四、大会发言人员与发言方式 /35
- 五、5月2日第一次大会讨论 /42
- 六、休会期间小组讨论 /76
- 七、《解放日报》特辟专栏参与讨论 /89
- 八、5月16日第二次大会讨论 /103
- 九、5月23日第三次大会讨论（提纲） /139
- 十、毛泽东的《结论》讲话（提纲） /141
- 十一、《讲话》在另外两种语境中的不同言说（存目）
- 十二、讨论中不确定内容考察（存目）

· 第二辑 专题研究 ·

- 一、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历史诸问题新说 /147
-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180

- 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考辨 /186
- 四、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议题形成过程考察 /200
- 五、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 /219
- 六、《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历史内情探析 /232
- 七、周扬与《讲话》权威性的确立 /250

· 第三辑 未竟思绪 ·

- 一、《讲话》文本解析（提纲） /269
 - 二、《讲话》修订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修改（提纲） /278
 - 三、《讲话》原始口述版考察（线索） /281
 - 四、《讲话》中所提八个文艺学方面的问题（线索） /282
 - 五、《讲话》研究断想辑存（提纲） /283
 - 六、陈云与《讲话》文本的形成（提纲） /294
 - 七、关于丁玲在座谈会上发言的确定（提纲） /296
 - 八、关于艾思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提纲） /298
 - 九、关于周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提纲） /301
 - 十、关于刘白羽谈文艺座谈会的几点失实之处（提纲） /304
 - 十一、座谈会前毛泽东找去谈话的人（线索） /307
 - 十二、整个座谈会实况一文需要改进的问题（提纲） /309
 - 十三、延安文艺座谈会系列课题研究工作总结摘要 /312
 - 十四、座谈会发言者可联系的同期文献、文章索引 /315
- 代跋：生命有多深，思想有多高 …… 朱鸿召 /316



第一辑

实况再现

一、座谈会总体情况及相关问题说明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总体情况如下：被邀请的文艺家约 70 余人^①，加上会议规定的部分文化艺术和宣传单位必须参加者，全体正式与会代表约 100 余人；由全体与会者参加的讨论会共三次；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引言》演讲；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与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休会期间，与会代表比较集中的单位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以下简称文抗）、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边区文协）等均组织召开了小组讨论会；在整个会议期间，《解放日报》文艺版特辟“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会议议题的讨论；在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中约有 40 余人次在大会上发了言。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第一，毛泽东的《引言》演讲与《结论》演讲，后来被辑在一起构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但是就“实况”而言，人们所看到的公开出版的《讲话》与座谈会上的演讲内容是有区别的，本文将对未载入《讲话》文本的演讲内容作出力所能及的钩沉。第二，就“实况”而言，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次、发言次序和发言内容等问题，是最难恢复还原到历史情境中的课题。

^① 2006 年 4 月 12 日笔者电话采访黎辛。黎辛说：“座谈会召开前夕，座谈会参会人员拟定者之一舒群对我说：大约给 70 个左右的文艺家发了请柬。发请柬的文艺家大部分是从国统区来的。”

据延安文艺史研究资深专家孙国林先生说：“我是由何其芳担任班主任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的学生，还在何其芳老师在世的时候，他曾对我说：要搞清座谈会哪天、哪些人发言，讲了些什么，是不容易的。你硬要去搞，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没有必要。”^① 我们知道，何其芳的遗稿《毛泽东之歌》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全面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由于无法突破还原历史，再现实况的“难题”，在述及座谈会内容时，并未按照会议原本程序来结构文章，而是采取部分与会者发言的特殊内容与毛泽东《结论》中所讲内容的对照来结构文章的。孙国林先生从何其芳在世时起就开始了座谈会实况问题的探究，但从孙先生公开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及该文发表时由于篇幅长而被删掉的原稿^②相关内容看，孙先生至今亦未能攻破何其芳早年给他预言的“难题”。本书从记述“实况”出发，将根据座谈会的历史进程对这一难题作出解答。第三，本书所再现的座谈会实况资讯，主要来自与会者的回忆文字，对与会者的采访记录和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分析考证。由于时间的久远，与会者的回忆文字和接受采访时的口述均难免与史实有出入，所以本书随行文的推进对与史实有出入的回忆文字和口述亦将作出相应的辨析与考订。

^① 孙国林 2005 年 8 月 19 日给笔者的信。

^② 孙国林 2005 年 8 月 19 日给笔者随信寄来了《党史博览》2004 年第 6 期刊发《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时所删去的原稿相关内容。

二、时序风物、会场布置与作息时间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1942年5月召开的。按照延安地区一般自然时序，5月是正式进入夏季的月份。这时迎春的水果花早已打结，晚飘的杨柳絮也已谢落，山上沟底的树木正展开枝梢猛长，而杨柳成行的地方便会形成一片绿荫。这个季节，即使生活在延安及所有北方地区的人们，也已完全退去了棉衣，甚至连毛衣也基本退去。而当艳阳高照的时候，一些人会索性脱去外衣，穿上半衫，来迎接久违的日光紫外线对人体皮肤的刺激。然而，1942年的夏天却姗姗来迟，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一天对应的是农历三月十五，这一天是谷雨过后第11天，而离立夏则还有4天。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尚未真正遭遇大生产的挑战，也未受到大批量移民的垦伐，满山遍野，树木森森。坐落在山坡底或山沟被大片森林包围的村庄，早晚常有阴气和冷风袭来，——这也正是直到5月23日所照的相片上，毛泽东等人还穿着棉衣的缘故。毛泽东究竟为什么把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间定在5月，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延安文艺界问题在此前的3月份突出暴露出来并引起强烈的反响之后，4月中上旬是毛泽东紧锣密鼓与数十位文艺家进行交流和对文艺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的时间，直到4月下旬他还约请了鲁艺的几位党员教师进行了交谈。也许的确是会前的准备工作历史地将会期推到了5月，然而将这样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放在5月份召开，仍然让人不得不产生许多联想。

5月，是整个延安一代人心目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月份。早在1939年5

月，陕甘宁边区文联就曾编辑出版过一本名为《五月的延安》的颇具影响力的书。该书《前记》说：“五月是刺激革命情绪的月份，延安是发动抗战力量的中心，五月的延安的生活，该是多么热闹，紧张，丰富，活泼的啊！”“在五月里，有着多少可纪念的日子：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五卅——那是世界上整个的革命浪潮，特别是中国民族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留下的脚印。”^① 该书中《生活在五月的热流里》一文写道：“四月的延安还是枯燥的，宝贵的绿色还埋葬在地里。但，似乎是欢迎战斗的解放的五月吧？秃山上绿草像这秃头顶上长出浅发似的布满着，枯树枝也披上了绿衣。……五月这个不平凡的时日”，“令我兴奋着”。^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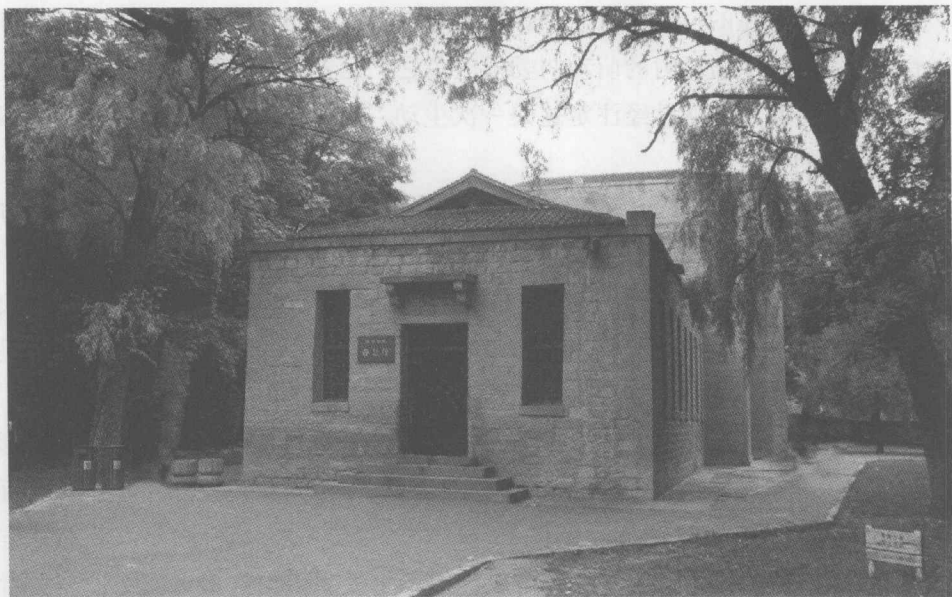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古城，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成为革命的圣地

由此我们知道，在延安一代人心中，5月，既承载着世界革命的光辉历史信息，同时也承载着万木争春的自然时序信息。而这些无形的信息，对每一个参加过文艺座谈会的人来说，都有着充分的体验。草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40年之后还深情地说：“5月，是个美好的月份，她被多少诗人、歌手称颂过。她不仅把春天浓重的美妙的气息带给人们；而且，多少伟大的

^① 《五月的延安》编辑委员会：《五月的延安》（前记），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抗战文艺”工作团1939年版。

^② 《五月的延安》编辑委员会：《五月的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抗战文艺”工作团1939年版，第21页。



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地址

革命事件发生在这个可爱的月份啊。巴黎公社就在5月里度过它的最后阶段；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恰恰在5月的头一天；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马克思的诞生也在5月；还有，我国‘五四’运动也是在5月里发生的。啊，5月，美丽的5月，红色的5月！”^①周立波也说：“5月里，延安的天气不冷不热。延河解冻了，浑黄的河水，弯弯曲曲地在泥沙淤塞的浅浅的河床上奔流，杨柳转了青，刺梅花的强烈的香气飘满了山沟。5月正是延安的春天。”^②黄钢在1977年5月21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难忘的延安之夜》中也深情地说：“延安5月的气候，是令人神往的。初夏的脚步逐渐地移近了，春寒却还没有完全消除。”金紫光则直接针对1942年的5月说：“1942年5月，那正是明媚的春天。西北高原的春风吹醒了延河两岸的山花野草，有的含苞欲放，有的碧绿丛丛，蔚蓝的天空，不时飘来朵朵白云。”这里，无论是人们所敬仰的浸润着鲜红色的革命5月，还是人们感佩的

^① 草明：《五月的延安》，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②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88页。

充盈着春天气息的自然5月，都预示着对人类生命活力的催生与激励，都预示着人类自身生命活力的萌动与勃发。总之，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旦在时令上与5月联系起来，就已经注定这是一次生动、活泼、激越的会议，是一次极具创造性的会议。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里。这座办公楼于1941年建成，在当时的延安是最豪华的建筑。楼体分三层：三楼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二楼为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办公室；一楼分左右两翼，入大门的右侧为中央机关图书室，左侧是中央机关中办餐厅，文艺座谈会的具体会场就设在这里。

马加回忆说：“会议室并不十分宽敞，石灰的天棚却是洁白的，方格形的玻璃窗子分外明亮，靠着会议室的四周摆了一圈凳子，大约可容纳上百人。”^① 据笔者实地勘测，会场长12.66米，宽6.2米，总面积约78.5平方米。这个面积如果是站着，的确可以容纳不少人，但据许多人回忆，与会者都是坐凳子的。于敏说：“开座谈会时我们坐的都是长条凳，不是椅子。”^② 潘奇说：“开会时大家有坐条凳的，也有自带小凳或马扎的。我自己就是坐的自带的小凳。”^③ 即使坐凳子，按每平方米坐两个人算，整个会场亦可容纳160人左右。

但由于会议还有主持人，会场上还设有简单的临时主席台。温济泽回忆说：“当时有个主席台，不是高台子，而是平地，拉几张桌子铺几块布，上面坐着几个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毛主席在当中，朱总司令坐在旁边。”^④ 罗工柳回忆说：“主席台正对着门，离门有点距离，但不远，以能留开走人的巷道为限。主席台是一张长方桌，凯丰和主席坐在主席台上，总司令每次都坐在主席台的侧旁，也就是进门后右手的墙角处。”^⑤ 刘岷回忆说：“开会的地址就在杨家岭小礼堂的西厅。在厅内的西端放了几张长桌，桌的两边放了

① 马加：《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报》1987年5月30日。

② 2004年3月5日笔者电话采访于敏。

③ 2004年3月6日笔者电话采访潘奇。

④ 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⑤ 2004年3月1日笔者电话采访罗工柳。



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场（复原陈列室），主席台与听众席之间的过道空间被夸大了些椅子。其他地方也是一排一排的靠椅。”^①何其芳回忆说：“会议室里摆着一张铺白布的长方形桌子。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朱总司令等，他们坐在一头。围着这个做主席台的桌子，三面都放了许多椅子、方凳和长凳。多数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都坐在椅子和凳子上。也有一部分坐在长方形桌子的另一头。”^②综合上面忆述可以肯定，与会者都是坐着的，有坐椅子的，有坐凳子（各种凳子）的；会场设有主席台，并留有人行道。除主席台外，会场的具体形制可能于敏的说法更符合历史原貌：“靠墙靠窗摆了若干张小方桌，四边有长凳。礼堂当中也摆了若干条长凳。”^③2006年5月21日下午，笔者与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唐荣枚女士在座谈会会场就这个问题做了现场订对，她基本同意我所复述的于敏关于会场具体形制的说法，但她补充说：“长方桌只在会场西门的一面摆着，是主席坐的地方，其他三面靠墙围

^① 刘岷：《琐事纪实》，孙新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② 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2期。

^③ 于敏：《银幕外的声音》（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了一圈长条椅，长条椅围着的场地横摆着一排一排的长条凳。主席的《引言》报告是面对所有与会者站着讲的。”这样，总共能容纳150—160人的会场，再设一个主席台和留出人行道，可能最多只能容纳110人左右的与会代表了。难怪第三次会议增加了部分旁听者后，便有人要站着。而毛泽东做《结论》时来旁听的人更多了，会场便只能临时从室内移到室外。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息时间是与会者记忆分歧最大的问题。有说会议是在上午开的，有说是在下午开的；有说晚饭在会议上吃，有说午饭、晚饭都在会议上吃。

罗工柳回忆说：“座谈会开了三次，第一次主要由毛主席做《引言》，时间比较短，我的印象中是一上午，也没有吃饭。主席做完《引言》，也许有人发言了，但我记不得了。”“第二次会议时间也不长，但发言的人很多。第三次会议开了一整天，中午饭和晚饭都在杨家岭吃的。”^①

何其芳回忆说：“第一次开了一整天。中午，大家在杨家岭中央机关的食堂吃了午饭。下午又继续讨论。第二次会议是在5月16日开的，也是一整天。我还记得，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照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穿的退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方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丁。”^②

刘岷说，第一次会议“一个上午好似中间并未停息。……中午与会同志都留在杨家岭食堂吃饭（那时还没有杨家岭饭厅）。食堂就在中宣部山下的几间小平房内。党中央的同志和大家一起进餐。吃饭的中间，毛主席端起他坐的那张桌子上的半盘炒鸡蛋送到我们桌上，他要大家多多加餐，亲切地说：‘我们吃不完了，送给你们吧……’同志们推说，我们这里也有，还是请主席多吃些吧！结果那半盘菜还是留给我们吃了个干净。饭后，大家陆续回到小礼堂，中央的领导同志也没休息，而是三三两两地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第三次座谈会是在一个下午举行的，大家发言之后，天色已近傍晚。”^③

^① 2004年3月1日笔者电话采访罗工柳。

^② 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时代的报告》1980年第1—2期。

^③ 刘岷：《琐事纪实》，孙新元、尚德周编《延安岁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欧阳山尊说：“座谈会是开整天的，午饭就在杨家岭吃。记得吃饭时我同徐特立同志坐一桌，他老人家一面吃饭一面热情地谈着他自己学习的心得……在整天的会议中，我没有发言。”^①

于敏回忆说：“座谈会开了三个下午，每次开完会都在杨家岭吃饭，最后一个下午讨论完，主席做《结论》是在吃过饭的晚上。记得主席做《结论》时，还很幽默地说，座谈会开了三次，请大家吃了三餐。说这话的时候他还举起三个指头以作示意。”^② 于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还强调说：毛泽东在做《结论》的“过程中，有两次伸出三个指头，说：‘请了三餐。’这是因为每次开会，都招待晚餐，除大米饭，还有红烧肉和煮鸡（这可比现在在北京饭店的宴会更加美味）。”^③

对于上述几种说法，简单比照，很难辨别清楚哪一种更符合历史实况，因为每一位亲历者的说法都不一样，以至于试做定量分析都很难操作。然而我们在众多亲历者的忆述之外，找到了一份足可作为参照系的历史文献，这就是4月27日毛泽东与凯丰联名发出的那份“请柬”。尽管我们在致舒群与致公木的两份请柬上发现了最后祈使句内容有“敬希届时出席为盼”与“谨希莅会”之别，但“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的主体内容则是一样的。正是这个“下午1时半”的时间限定，使得我们可以排除对第一次座谈会作息时间忆述的许多误谈。如罗工柳、何其芳、刘岷、欧阳山尊他们对座谈会作息时间的回忆都是不准确的，或者可以不按常规逻辑读解而另作理解，只有于敏的回忆与请柬所记载的时间是吻合的。这样，我们可以将座谈会的作息时间排列如下：

5月2日第一次座谈会，下午1点半开始，毛泽东做完《引言》报告后，中间略作休息给与会者以简单的酝酿时间，然后开始讨论，至下午5点多6点时，讨论结束，与会者在杨家岭沟口中宣部机关驻地下面的几间平房吃饭，饭后与会者各回自己单位。

关于第一次会议的作息时间，这里还可引述几则回忆。蔡若虹回忆说：

① 欧阳山尊：《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4期。

② 2004年3月5日笔者电话采访于敏记录。

③ 于敏：《银幕外的声音》（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